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中东变局与中美大国关系

时间：2014年10月27日 13:00

地点：清华大学公管学院一层报告厅

齐晔：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特别的活动，由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这次活动，在介绍我们今天的演讲人之前，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首先一位是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薛澜先生，还有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负责人李成教授。

我们今天谈的是中东问题以及在这个背景下的中美关系问题，有人说这两个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在当前中东局势下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我们从新闻上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电视新闻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道，有很多冲突，甚至是一些混乱的情况正在中东发生，中东可能离中国有很远的距离，但是中国的确对于这个地区有非常重要的兴趣，尤其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得更加强大之后，中国看到比如在能源、在石油进口方面的需求，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量不断增加，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是中东石油的第一大进口国。而从经济方面和其他利益方面的来看，中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而我们也看到中国可能在这方面也会有更多的投入，那么，中国就需要考量现在中东的局势和形势，然后制定一个相应的中东战略，来和美国这样的合作伙伴共同推进这个战略。在中东地区，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解决很多问题或者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

我们今天有两位学者来到现场，这两位学者也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丰富的经验。

第一位演讲人 Martin Indyk 博士，他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副会长，也是外交政策项目的主任。这个外交政策项目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五大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分支，同时他也是我的上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100084

电话：+86-10-6279-7363 传真：+86-10-6279-7659 电邮：brookings@tsinghua.edu.cn
<http://www.brookings.edu/about/centers/brookings-tsinghua>

级。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经验非常久，在 7 月返回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他是奥巴马总统委任的巴以和平谈判特使。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他有两次担任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同时也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高级主管，他也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他研究、教学和实践过程中，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关于中东和近东的一些智库，在这些领域中非常多的知名学者也很支持他在中东和近东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今天有时间来听取一下他的宝贵意见，在他演讲之后，我们会邀请评论员给我们评论一下，然后还会有个问题时间。现在有请 Martin Indyk 博士演讲。

Martin Indyk: 谢谢齐晔的介绍，谢谢公管学院的院长，谢谢您来到这里，谢谢公管学院以及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这次会议。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对于我们布鲁金斯学会来说，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在我们的这一段合作关系中所做的这么好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多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对于布鲁金斯学会来说，我们已经和清华建立了 8 年的合作关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我们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我们在多哈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两年前建立的，在新德里。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三个之一，也是我们首先建立的，我们希望把它建成一个全球性的智库，所以这个中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现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不断地在崛起，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反映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增长的力量。如果说你把中国在中东的力量呈现以及在欧洲、在拉美或者和其他大国，比如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东发挥的作用还有待体现它的大国地位，很可能也会和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有关系。在美国看来，中国需要承担起相应的作用，来稳定中东的秩序。中国对于中东石油进口不断增长的依赖度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美国希望在这个问题深重的地区做出进一步稳定的努力，目前这个努力受到一些向下的压力，我们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希望来共同维护中东地区的平稳。

中东的现代国家体系在很多年前建立，在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出于当地历史的发展而带来的自然结果，在亚洲，像中国所在的地区，这些国家长久以来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在中东的这些国家划分是由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在一战之后划分出来的国家，像由皮科（音）和赛克斯这两位英法国的人划定了中东地区现代阿拉伯国家的边界，英国当时对犹太人承诺说给他们一个家，在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地区给他们一个家。所以，出于这样一种试验的结果，就形成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现在的边界。当然，本来当时应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但是现在这个国家还在建立的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人为分解的国家体系、边界或者是安排。这些中东国家慢慢地获得了国际认可的身份，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致协调的，可以说，好像马赛克一样一块一块的，这些不同的人群、不同信仰的部落或群体之间的这种自然的居住区域与由殖民者所划定的边界并不是一致的。像古埃及的文明持续了 5000 多年，它是有一脉相承的国家，基本上全部的人口都是逊尼派，大约有 15% 的埃及人口是古基督教派。像沙特阿拉伯，它是由联盟形成的，阿卜杜勒国王和瓦哈比，宗教主要是基于瓦哈比教派的部落系统，是由战争不停地征服临近的部落，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沙漠中的沙特。当时瓦哈比占据一部分，阿卜杜勒作为皇室的一部分，共同来治理。至于其他的中东国家，是之前由殖民者人为划分的国界。

今天我们看到了中东的这些国家有目前这样的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苏伊士运河南部的英国军队撤走之后，由美国军队填补了真空，当时和苏联进行冷战，冷战也对这个地区带来了一些影响。还有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 90 年代时入侵科威特，当然最后把他赶出去了。到最后美国成了这个区域的主导力量，美国基本上把重点放在确保中东石油的自由流动上，当然是从中东流动到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工业国家，包括日本。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口任何的中东石油，当时这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当然还要确保以色列国的生存权，这也是当时美国的利益，剩下的就全是石油、石油、石油，还有以色列。

为了保障这个区域的安全稳定，我们当时决定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解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样才能够确立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心脏地带的稳定。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君主的权力，尤其是在沙特和埃及这两个国家，以确保这些国家的稳定性。当时美国也希望保护自己的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还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其实这方面的冲动在中东地区有所压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做了一些决

策，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认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就是稳定而不是其他的，所以我们当时又回头和这些君主制的国家进行了合作，虽然这些君主制国家没有充分地给人民权利，但是美国还是回头跟他们合作，以确保他们的统治或者镇压人民的成果是有效的，结果就没有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所以说，我们总是面临着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比如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利益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选择利益，有时候导致我们两方面都得不到，因为中东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混乱或者说革命的情况，在过去的 5 到 10 年都是这样一种混乱的情况。而这样一个动态的局势，尤其是中东当地的人民起义来要求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之前选择和君主站在一起是错误的。

这段重要历史还有一段我刚刚跳过去没有说，在“9·11”事件之后，当时由于基地组织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它产生的影响大家也知道，导致了布什政府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把萨达姆赶下台，来建立伊拉克的民主。在促进伊拉克民主的时候，我们设法建立了一个什叶派为主导的伊拉克政府。这些情况的综合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整个区域开始动摇了，不稳定了，不管是像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带来的还是利比亚的反叛带来的不稳定，利比亚的反叛也带来了卡扎菲的下台，还有在叙利亚的战争，也导致了 20 万人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 500 万人流离失所。而现在看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崛起。

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区域的秩序是在 100 年前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的分解或者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了，而且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革命之后混乱的状态，或者说是反革命状态，包括在埃及的领导人。在这场混乱之后出现的就是这些圣战国家，也就是为伊斯兰国进行圣战的国家。在这个区域之内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的稳定的反义词，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问题，不仅是为美国带来了问题，是对全世界包括中国来说都带来了问题。圣战组织现在不断地招募，我知道他们在过去几天中甚至招募了一些政府官员，甚至从中国这边招募人，大部分的人还是来自于一些西欧国家和美国的一些人士，甚至从澳大利亚都招到了一些人。圣战组织的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威胁不仅是在中东地区的，也是威胁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我们现在看到了在过去几周当中的恐怖主义的行动，包括在澳大利亚等，现在人们担心的是这种现象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现在在这个区域有三个基本的冲突，这三个冲突是互相交织的，使得在这个混乱中寻求秩序非常困难。第一个冲突就是巴以冲突，以前称之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当时美国确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其他国家、和约旦国家形成了和平协议，这样一来就把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种冲突减少到了巴以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应该通过《奥斯陆协议》来获得解决的，《奥斯陆协议》是美国在 20 年前倡导而达成的，在过去那么多年都希望以此解决巴以冲突，但现在巴以冲突成了一个长期性的冲突。我们看到，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在今年夏季一直在持续当中，这是加沙地带在 6 年当中的第三次战争了，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很可能我们马上在加沙地带就会有另一次战争。现在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有很多冲突在发生，现在我们也是在花很多精力能够去解决这个地区的冲突，其实是导致了这个地区核心地带的冲突。

第二个冲突就是教派冲突（宗教冲突），像黎巴嫩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已经扩展到了其他地方，到了伊拉克、叙利亚，现在在也门，在巴林，也在不断地发展下去，而且把整个阿拉伯地区都拖进了这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这种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可能会在整个区域中扩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逊尼和什叶派都是生活在中东的不同国家。

第三个冲突就是逊尼派内部的冲突，这个冲突本身就是一些逊尼的君主，特别是包括阿联酋国家和埃及，他们是一些保守派的逊尼领导人，和穆兄会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哈马斯的继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这种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在不同原因之下导致非常难解决，我们想要去充分利用这种联合政府或通过联合去对抗圣战组织的时候，但是圣战组织的威胁对美国是巨大的，而且对于其他国家的威胁也是巨大的。在这个联合体当中，有逊尼派的君主派，但是这些酋长或这些君主也是有分裂的，因为他们不希望针对圣战组织的这种战争最后是给什叶派带来了好处，在伊拉克就是如此，比如在伊拉克这边，我们打败了圣战组织，最后给伊拉克的什叶派带来了好处，给伊拉克也带来了好处。从沙特阿拉伯国家来看，他们认为伊朗这边也是个关键地区，因为圣战组织在这边确实带来了威胁，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特别是考虑到伊朗的核问题，如果说他们的核问题不能得到最终控制的话，最后可能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他们内部也有非常多的冲突，他们也不希望美国空军成为叙利亚的空军。如果说针对圣战组织的战争最后是去给叙利亚这边带来过多的好处，那么最后可能会带来他们不想要的后果。还有就是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他们也

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因为这样的战争最终可能会给伊拉克和叙利亚带来好处，并且是针对土耳其的利益。所以现在是有这样一个联盟，但是这个联盟当中的合作伙伴他们自己的重点和他们自己利益的考虑是不一样的，和我们美国的利益考虑是不一样的，这只是目前三种冲突的表现的一些例子。

可以看到，在这三个冲突之下，我们整个局势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需要一种战略来恢复中东地区的秩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当然，我们一定要去找寻一种方法去打败圣战组织，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有非常务实的方法，并且把事情的优先级进行分类。我们要知道是圣战组织还是阿萨德这边的争斗。当然要花一些时间重新建立伊拉克的军队，让在巴格达的新政府能够重新和逊尼派联系，保证逊尼派在一个团结的伊拉克当中的角色，并且要花一些时间把逊尼派部落的军队力量充分地利用起来。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些军队感觉受到背叛，因为前任领导人以及美国离开了这一地区让他们感觉受到了背叛，同时要花一些时间处理圣战组织和阿萨德的关系。

在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们还要去处理库尔德人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中东地区没有相应的力量从圣战组织这边获得一些领土。我们当然可以对圣战组织进行一些遏制，比如现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有一些行动，当然也可以通过空袭的方式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一些遏制，但现在是问题是没有能力在中东地区从圣战组织的手中把这些领土夺取回来。现在也很难让美国到伊拉克和叙利亚重新部署自己的军队，当然奥巴马总统也不太愿意去这么做，因为他当时承诺过，自己作为美国总统，一定要结束美国在中东的战争，而不是开启一个新的战争，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如果说能够在中东地区重新恢复我们的秩序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依赖于我们的联盟来做这些事情的话，这里边包括很多地方，包括土耳其、约旦、以色列、埃及等。这些国家现在是个问号，其他国家都有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利益，以色列和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都非常担心伊朗，也非常担心伊朗在叙利亚的同盟阿萨德，也非常担心穆兄会和哈马斯。所以说，有可能在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来建立这样的合力，就像在解决巴以冲突一样，我们认为通过这方面可以去恢复这个区域的稳定，同时也需要美国去回到这样一种政策上，而且应该是以史为鉴，这种政策就是要以稳定为主，在一段时间之内应该以稳定为主，因为在我看来，这种混乱和不稳定需要我们把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优先级的排

序，这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这些专制领导人，可能需要他们去恢复国家的稳定，这种稳定之上我们才能够去进一步宣传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和自由。

考虑到现状，在短期之内我们应该先考虑的是稳定，这就要提到我要说的最后一点了，就是中国的角色和中国的利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稳定方面肯定是有利益的，因为这里石油可以自由流动，并且有比较好的成本，也是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如果说不稳定，确实会给石油市场带来混乱，为中国的能源来源带来问题。所以，在这里美国和中国是有共同利益的，应该可以共同合作，来解决当前的混乱局势，恢复到稳定。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应该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虽然活动范围有限，但是应该去真正扮演起自己的角色。中国的角色应该会在这个复杂的地区带来一些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我们相信在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合作应该能够获益，谢谢。

齐晔：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您的一些观点，确实，在中东地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局势，也非常感谢您对于中国在这当中能够扮演的角色的评论。在这里我要提一下，今天和我们在这里的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研究员，包括于教授和阿塞尔（音）教授。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有高级研究员，还有一些常驻研究员和非常驻研究员，我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齐晔。

第二位讲者是唐志超教授，唐教授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室主任，同时在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工作。他一直从事中东问题的研究，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他曾经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同时也是中东研究室主任。他现在是在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在中东问题的研究方面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在关于中东、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这些问题上，我们也经常看到他非常活跃，发表了很多言论。唐志超教授和 Martin Indyk 博士过去也曾经在华盛顿见过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请唐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

有请唐教授。

唐志超：很高兴在这儿能见到 Martin Indyk 教授，我记得是在 5 年前我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和 Martin Indyk 教授私下交流过，他说他还没有来过北京，我当时就很诧异，因为

在布鲁金斯、在美国这么重要的中东研究的学者竟然没来过中国，没来过北京，现在见到了，而且我们这次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中东的问题越来越纳入到我们和美国顶尖学者的重点关心框架之下。大家也知道，中东问题也纳入到中美关系对话中，确实，中东问题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构建越来越重要。

大使先生刚才谈的最中心的就是给我们介绍了一战以来整个中东的秩序，它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坍塌的，未来怎么重建，中美在这其中扮演什么作用，他的好多看法和观点我都是很同意的。我想简单地作几点评论。

第一，我非常同意，一战以来形成的中东秩序正在坍塌，而且整个中东过去几十年来平衡稳定的局面现在已经被破坏，整个中东的政治生态也在改变，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的变化，“阿拉伯之春”最初的表现是政府和民间的关系的变化，但随后的发展，整个性质都在改变，民族的关系、宗教的关系、教派的关系、宗教和世俗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一系列关系都会被打破，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都在被打破，所以整个中东的持续确实处在重建的过程中，我说的是新旧秩序的重建，或者处在过渡阶段，从现在来看，这个过渡阶段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未来10年、15年，现在这样的分析很多，当初“阿拉伯之春”出现的时候，大家都预测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渡阶段。

第二，大使先生刚才提到在旧秩序的破坏当中，现在确实存在着他提到的三组冲突，一个是教派的巴以问题，一个是逊尼派内部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对地区秩序的坍塌起了一个最关键性的作用的三组冲突。我认为还有一个冲突大使先生没有提到，美国在中东秩序的坍塌中，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它在这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中东秩序的坍塌确实有历史根源，当初确实是人为而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但是它真正被打破就是在2003年以色列战争之后，当年小布什政府打伊拉克的时候，我记得当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警告，说这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事实的发展也正如他所说，整个中东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利比亚，从巴基斯坦问题到伊朗核问题的背后，美国的因素在中东秩序的坍塌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个问题形成的初期，美国人在这中间并不是扮演重要

角色，但是在这个秩序的破坏中，美国更多的扮演了破坏的作用，最早的形成主要是英法的推动，但在坍塌的过程中，英法的作用基本上没有，主要是美国在扮演作用。

刚才大使先生谈到了中东秩序的重建，他特别提到了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但我个人感觉，伊斯兰国的问题可能不是中东秩序重建的关键，中东秩序重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个人感觉要抓住几个点，一个正是像大使先生一直强调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第二个是叙利亚问题，美国人在叙利亚问题上必须重回一战之前的轨道。我记得奥巴马总统带今年初接受纽约杂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在中东重建一种平衡的观点，我个人对他的这种提法一直有很深的印象，确实美国在亚太有着再平衡，他是不是在中东有一种再平衡的想法，就是要重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朗人和沙特和以色列的这种关系，如果把这种关系重建好了，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恢复秩序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大使先生提到了中美在中东发挥的作用，正像一开始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在中东的利益非常少，当年提到了中东在中美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因素，但现在我们说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可能仅次于中国的周边，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地区。但中美在未来中东秩序的构建，包括地区安全的治理、地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政府现在特别强调的是国家的治理，我想中美对此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我们现在提出以经济文化为导向“一带一路”战略，其实中美也有可以合作的空间。

我想，中美在中东的合作还是有限的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有限的，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政府想撤离中东，我们中国虽然现在在加强对中东的关系，但要填补中东现在出现的权力真空是有限的。另外就是从中国自身的能力来讲，也决定着中美在中东的竞争或者合作都是有限的。

谢谢。

齐晔：谢谢唐教授。

接下来到了讨论的环节，希望各位踊跃举手提问，提问的时候请自报家门。

我作为主持人，首先借用这个优势，我想问两位演讲人每人一个问题。首先问两位的一个问题就是，唐教授刚刚说除了 Martin 所提到的三组冲突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中东地区不稳定、秩序混乱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当中对伊拉克造成的影响，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唐教授的这个评论？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想问您，美国希望中国在中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希望中国在现在的情况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给唐教授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您也提到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你能否定义一下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是什么？我还想知道您同不同意在中美之间进行协作，应该怎么样去协作？中美之间在中东问题上真正能够合作吗？尤其是您说到美国即便不是原因也是触发了中东地区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Martin Indyk: 谢谢齐晔教授，谢谢唐教授，谢谢您的评论。

当然，毫无疑问，美国大约有 30 到 40 年的时间都致力于稳定中东地区，在“9·11”事件之后决定进入伊拉克，把萨达姆赶下台，这当然是一个导致了不稳定的决定。当时采取这个行动是出于一些担忧，因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出于这个担忧而决定的。之前在我的讲话中也解释过，当时希望建立伊拉克的民主体系，实际上把占主要人口的什叶派推上政府而建立民主体系。这就违反了基本的后任政府的策略，和我们之前的政府策略是相反的，之前我们是希望能够遏制住萨达姆，不让他成为邻国的一种威胁，我们当时希望伊拉克不会变成伊朗那样的国家，否则就会对海湾各个国家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和威胁。但是打掉萨达姆的过程中，我们最终还是把他解决掉了，而他对于伊朗来说也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使得伊拉克在战后建立了马利基政府，这也有助于局势的稳定，有助于解决我们所造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广泛地投入，美国军人也付出了献血的代价来纠正我们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当时也部署了很多美国军队来重建伊拉克军队，给伊拉克人带来更好的稳定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带来周边地区的稳定。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想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没有努力，而是我们看到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这个基本的冲突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马利基政府只是为什叶派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全体伊拉克人的利益着想。这样的一个局势我们是改变不了的。而美国人也不愿意把自己国民的生命再投入到伊拉克了。的确是，我们当时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但在之后 10 年我们

也不停地纠正我们所带来的问题，但是没有取得想要的效果，就造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的后果。我也看到，叙利亚也受到了波及，因为有大量物资，比如人力方面的资源和实际的物资本来是投入到伊拉克，但是却落入了其他人手中，还有在阿富汗也是这样，美国不愿意曾经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去对待叙利亚的问题。我们考虑在困难中重建秩序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美国公众再继续向中东地区投入的意愿非常有限，比如支持伊拉克空袭，但是其他的一些行动公众就不是很支持了。

还有一点就是，人们在回顾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当时去控制了整个区域，特别是在埃及这边的情况，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推翻当地的统治，是当地的人民推翻了当地的统治，是埃及的人民推翻了這個统治的体制，是埃及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去选举了穆兄会的政府。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辅助角色，但是主要的力量是埃及人民，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有时候人们会说美国是主宰了这个区域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是当地的人民起了主导作用。

唐志超：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作一点补充。

确实，就像 Martin Indyk 所说的，当前中东这种大的乱局的出现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我认为中东秩序导致现在这种局面，除了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外，现在这种乱局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阿拉伯之春”以及到现在的发展演化，第二个是这几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中东实行的战略收缩政策，我想，这两个政策是改变当前中东秩序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美国从中东战略撤出和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另外是齐老师提到的中美在中东的合作问题，其实，中美在中东一直有合作，包括伊核问题、巴以问题，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认识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性，美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最初的判断、认识，到现在应该说越来越跟中国的判断趋同。

构建中东的新秩序是中美未来发展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奥巴马政策和小布什政策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奥巴马政策是重回稳定，而小布什政策是打破这种稳定。我想，

在中东恢复秩序、恢复稳定上，中美有许多共同的方面，尤其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可以做很多合作。

Martin Indyk: 我其实同意唐教授的观点，我再讲两点。

首先，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不断增加，而美国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是在降低，其实美国现在不依赖中东的石油了，比如在奥巴马政府之下，明年我们会成为石油出口国，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使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战略不一样了。当然对于石油的自由流动以及石油的价格方面，我们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石油是流入了像中国、印度这样一些我们关键的贸易伙伴，以及欧洲、日本这样的我们的联盟国家，所以这种利益还是在这里的，但是这种利益不是直接流入美国了，现在其实是中国这边在享有利益的，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享有这方面的利益。现在美国的纳税人在赋税，其实是让这些石油流入你们这些国家的工业当中，我们在波斯湾部署了大量的军队，以大量的成本来保证这种石油的自由流动，其实我们是提供了一种公共物品，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利益的，这一利益是被我们其他的一些贸易伙伴国家所享有，比如中国。现在在这边我们肩负着这种负担，但是中国却是在其中受益的。

齐晔：现在请听众提问。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的第一个问题请教唐教授，我们注意到，中国前驻中东大使吴思科上个月发表了一个很有名的谈话，大概有 100 人在中东参与了圣战组织的培训，您认为圣战组织对中东是多大的威胁？中国政府有没有针对圣战组织的明朗政策？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全球范围之内共同对抗圣战组织，请问美国对中国的希望是怎样的？

提问：我的问题是问 Martin Indyk，我来自于新京报。我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共享利益之下，您觉得这种互惠互利的中美合作潜在机遇在什么地方？奥巴马总统会不会在和习主席的见面中进行讨论呢？

提问：我来自南加州大学，我问 Martin Indyk 博士一个问题。

你觉得美国究竟需要中国什么东西呢？是需要一定的物资，还是直接派军队，还是进行其他方式的参与或支持呢？这个问题也是问唐教授的，中国是不是愿意去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来共同对抗圣战组织呢？

唐志超：第一个问题，关于吴思科的报道我也看到了，我也没有相关的消息，但我从其他媒体看到的消息是，这一次圣战组织确实对中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了重要的威胁，威胁源主要表现在几方面，第一个，现在确实有一些人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这个数字有好多种。另外，我们现在的周边地区，不仅是国内有前往参加圣战，从东南亚到东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都有大量的人前往参加圣战，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了容纳东突和资助东突的恐怖组织。另外，叙利亚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仅次于当年阿富汗圣战这种国际性、全球性的圣战，而这次圣战跟过去相比，它的威胁性可能更大，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内部的东突分子、恐怖分子第一次加入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网络，他经过实战的训练，加上从恐怖组织的网络的建立、恐怖手法和技术的学习，会使他们有一个更新换代、升级的可能性。另外就是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的威胁，包括人员安全，包括我们对当地企业的投资，都构成了威胁。

Martin Indyk：中国愿意或者能够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们要现实一点，首先有一点要排除的就是中国派军队去这个事情，基本上是要排除掉的，我觉得原因是，第一，你们愿意参与反恐合作，但是你们认为中国跟美国这边的情况不一样，你们在这方面准备付出的行动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期待是应该要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在反恐的合作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做的，中国和美国都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公民和美国的公民很可能会受到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可能会受到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这种招募人士不仅加强了他们的恐怖力量实力，而且他们提供了一个训练基地和训练营，让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去经历这种训练，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伊斯兰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而且是宣传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已经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谁知道以后他们是不是还在其他地方进行相应的宣传活动呢？这是中美之间共同担心的一点，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威胁，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信息互通，或者是就我们的行动方式进行一些沟通，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级别的合作。

要让中国人不要再去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找到一种方式去减少目前圣战组织进行的招募，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招募一直在进展下去。

第三方面，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能力去贡献这样的行动，就是要去切断圣战组织的资金来源，圣战组织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海湾地区，现在他们还有一些金融交易，特别是通过石油走私等等，圣战组织获得了非常多的资金，我不知道中国在这方面能不能帮忙，我们也是可以进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进行合作的一些可能的程度。

提问：两位教授和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一个政府部门。我的问题是提给 Martin 教授，刚才感谢您对中东当前局势的梳理，您提到当前的中东局面应该由中东人来负责，我想请问，中东未来的局面是不是也应该由中东人为主来做出？第二个问题，刚才您提到美国在中东政策制定时提了一个核心词——利益，感谢您的坦率，我想问，美国政府在提出这个中东政策的时候前后出现了反复，那么，你们考虑的利益和文化、历史发展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美国的利益、中东人利益、全球人的利益怎么来平衡？什么是真正的利益标准？

提问：我是在外交学院教书的一位老师，我想问一下 Martin 博士，巴以和谈破裂的原因是什么？

提问：我的问题是，出于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美国会不会打压或者降低我们中国在中东地区在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性，或者降低中国在中东地区重建过程中的影响力？

提问：我来自华尔街日报，我想请问大使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和中国的合作，美国能不能够平衡？因为中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美国怎么能够在这方面达到平衡呢？叙利亚方面就是很好的例子。

Martin Indyk：巴以和谈的问题，我三分钟肯定是讲不完的，但是我尽量回答其他的问题，或者作一些讲解。

由中东人民来主导中东的命运，我觉得这应该是你的问题，这是美国政府永远面临的双重困境，是由政府还是人民来主导呢？这方面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解释过，过去几十年以来，我们政府一直敦促当地政府去满足他们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一直都失败了，而且人民会反抗当地政府。现在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去恢复秩序，是不是要跟政府进行合作呢？这方面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确实要取决于实际情况，我们要方法去更有效地平衡。中东这边的情况确实非常困难，我们可能尝试过各种方式，有时候尝试一种比较中立的中间路线，但是这种环境并不是有利于我们走中间路线，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些选择，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之前的稳定路线，然后再去寻求平衡的方法，这样才能给人民带来稳定和正义。

巴以和谈的进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失败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互相之间缺乏信任，还有互相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巴以双方的公众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巴以民众都支持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双方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觉得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要求他们的政府或者领导者做出这个困难的决定。所以说，谈判破裂是由于缺乏信任，我想这是现在我们出现这么长期的很难解决的冲突的最核心的原因，而且对领导人的不信任以及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比如互相之间攻击、互相辱骂等等，都体现了这个不信任，谈判当中也体现了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他们之间打交道的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他们互相之间认为对方都不会真正地有诚意地去构建一个和平协议，这是在内塔尼亚胡总统和阿巴斯之间普遍存在的一个态度，这导致了整个进程很困难。而且我们看到，不管是耶路撒冷问题、难民问题还是边界的划定问题、互相认可的问题，这些核心问题上都有很大的鸿沟。我们也记得一点，过去的20年是很长了，在93年的时候巴以之间签订《奥斯陆协定》，本来应该是在5年之内执行的，而20年之后我们还是没有执行，这就导致了不信任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双方之间强硬态度的进一步升级。所有的这些问题已经被很多情况证明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而在巴西和谈过程中，美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国家。

在叙利亚问题上，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政府 and 俄罗斯政府站在一起，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而美国的立场则是支持把阿萨德赶下去，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持叙利亚的反政权人民。这也反映出了一些基本的不同意见，就是说到底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保障这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安全？就俄罗斯政府和中国政府而言，他们都相信最好的保障叙利亚

的稳定办法就是支持阿萨德政权，而美国政府认为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叙利亚人民永远不会接受这个政权，尤其是有 20 万叙利亚人丧失生命之后，因此我们就需要进行政治上的组合来赶走阿萨德，而不是加剧这个局势。这样的状态，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现实情况，我们只能说和而不同、或者同而不和，我们允许双方持有不同的意见。

齐晔：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积极参与到提问当中，很抱歉有人可能没有机会来提问了。请和我一起再次感谢两位杰出的演讲人，谢谢他们。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非常感谢。